

张岱年

◎ 张岱年 著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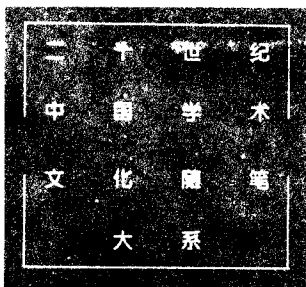
术

文

化

随

笔



张岱年
学术文化随笔

◎张岱年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编选这套百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旨在立足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审视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历程，并进而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大系”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主要选编业已去世的现代思想学术大师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示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体验、理解、反思；“系列二”选编当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现当代学者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反思、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大系”分五辑（每辑二十卷），五年内出齐。严谨的思想体系、求实的学术品格、素朴的编辑作风是我们编选这套大型丛书的追求。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原作风格及其时代感，作品的行文造句、用词用字基本保持原貌。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有其处身时代的思想烙印。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套丛书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是所望焉，谨序。

王岳川

一九九四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总序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

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尔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新儒家、新道家；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得以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开窗敞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意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学界究竟该接受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半盘西化（温和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受古希腊的民主、科学

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不接受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像当代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那样，只要所谓“新”的反理性、反理想、反启蒙、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要现代性或民主、科学、真理、启蒙、公正，而走向经济消费主义和生命玩世主义（当代虚无主义）呢？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史而言，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而且，在世纪末，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东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

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时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

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代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学者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察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或独标“散步哲学”,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哲人们以本真生命为底色,以人类面临的世纪灾难为基点,为这千纪年的世纪末转换发出新世纪的“天问”——问向天人之际,问向古今之变,问向灵肉之间。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学者

总序/王岳川

第一编 哲学篇

- 中国思想源流/003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011
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的观念/025
试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037
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049
学术思想的继续与立新/070
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073
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077
我的哲学观/086
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088

第二编 文化篇


- 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099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107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18
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135
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145
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149
评“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评论/155
文化体系及其改造/164
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179
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191

第三编 漫笔篇

- 爱智/197
辩证法与生活/200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206
义理、考据、辞章/210
“百家争鸣”与“定于一尊”/213
“愚民”与“明民”/217
说杨墨/220
读经与读子/223
评“内圣外王”/227
谈士节/231
评“三不足”/233
辨程门立雪/237
礼义与人心/240
疑古与信古/242
修辞立其诚/245

张岱年年谱简编/248

跋：探索真理的道路/250



第一编
哲学篇

第一编 哲学篇

中国思想源流

人类哲学思想的推进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其中含正反合，然亦非机械的三段，亦许四段。但必有立定、有否定，有否定之否定，表面上复返于初。中国思想发展正是如此。在西洋哲学，整个历史是唯物与唯心，怀疑与独断之争。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是刚柔、损益、动静、有为与无为之争，在宇宙论上则是理气之争。

原始的正，是孔墨，是主动、益、刚，人为的。墨虽反儒，然其最根本的思想与儒无殊，只比儒更刚更动。初次的反，是老、杨，主静、损、柔，反人为。初次合，在汉代，但乃是一个停顿的合。再次的反来自印度，即佛教，比老、杨更极端。再次的合，便是宋明道学。其后又有反，是颜李，排斥老、杨、佛氏及汉宋诸儒的思想，往刚、动、益的方面走。继之又从外来了一个有大力量的反，即西洋哲学。西洋哲学本非统一，而总起来可说是偏于刚动的，此反打破了中国之旧传统，而亦做

了颜李的援军。今后的思想，当是吸收了西洋思想以后的新的合，而必亦是原始固有的积极精神之复活。

一、[源] 中国思想之结胎时代实在西周。中国思想之最初的表现于《诗》及《书》。《诗》、《书》大概都是周之中叶的作品，其中思想是主实、重人的，表现一种宏毅、刚健、朴实的精神。熊十力先生说《诗》云：“不离现实而别求天国，亦即于现实生活之中而具超脱意趣，未尝沦溺于物欲。”实最允切。周代为吾国文化初成熟之时，所以思想表现一种沉深、雄厚、伟大、闳肆、创造、前进气息，勤奋、勇猛、而又稳重、宏阔。中国文化之根本性征，中国哲学思想之根本倾向，实在《诗》、《书》中已大致决定。

在春秋时代，此种思想为一般贵族学者如季札、子产、晏子、叔向等所保持、发展。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实为中国人的基本态度。

二、[正之立] 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却也是集大成的人。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孔子哲学不是以前思想之反，而乃以前的思想之结晶与更进的发展。在孔子，古代的宏毅、朴质的精神更具体的表现着。“刚毅木讷近仁”，孔子自己实是一个刚毅木讷、气象深厚的人。

孔子一生极有积极勇进的精神，他重现实，重人力。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栖栖遑遑，奔波周游，图谋改良当时的社会。“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他的自述。孔子的根本观念是仁，仁即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现今的词语来说即是“努力扩大发展自己的人格使至于圆满，并助人扩大发展其人格使至于圆满”。孔子很注重刚、勇、义。孔子的思想宏大、圆融、中正，然而在根本上是积极的主动的。

孔子以后便是墨子。墨子比孔子更刚毅，却不及孔子之宏融。墨子是周代尚文的反动，他要把大禹治水的精神拿出来。墨子出身工农，所以能极端刻苦，丝毫不要享乐。他“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可歌可泣，他是古代宏毅、勇猛的精神之偏于一端的表现。

孔子刚毅而宏大中正，墨子则只刚毅。孔子讲节用，同时亦注重礼乐，墨子只讲严格的节用。孔子讲推己及人的仁恕，墨子要爱无差等的兼爱。墨子是孔子思想的一半极端发展起来，而排斥其另一半。但孔墨都尚人为，积极活动，刻苦救世，不怕牺牲，同是弘毅、刚健的精神表现。儒墨在当时虽成敌对之势，其实所争只在小端，如命与鬼，乐与非乐，义与利而已。

三、[初次反] 儒墨弘盛的结果，引起了反动，即道家思想。道家的前驱是避世的隐士，在孔子时即不少。渐渐才完成其思想系统，最早的代表当是老聃、杨朱。孔子重刚尚为，老子却要柔，无为。孔子主仁，墨子主兼爱，杨朱却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孔子、墨子都积极活动，老子却“不敢为天下先”。老子、杨朱是要全朴葆真，返于自然的。老子是看到人为结果常弄巧成拙，常只毁坏了自然而已，所以要“以懦弱谦下为表，以空

虚不毁万物为实”，要“常善救人，常善救物”。老子、杨朱之后有田骈、庄周，更发挥广大消极思想。道家哲学是儒墨的反动。

四、[正之继进] 道家的反动，没有阻遏了儒、墨哲学的进展。儒墨都吸收了道家的优长，而完成其更积极的思想。孟子、荀子继续发挥孔子思想，宋钘继续发挥墨子的思想。

在孟子，宏毅刚大的精神更进一步的发挥起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哲学主旨在“扩充”，要扩充性中善端以至于圆满。

荀子更进而创出了戡天的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他坚决主张克服自然以为人用，要“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荀子的制天论，后为《中庸》所发展，略加变更而成“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即加入于天地的创造中，一方克服自然，一方与自然调谐，即是协助自然。

《易传》也是发挥宏毅哲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刚健中正四字表出了中国固有精神之精髓。

五、[一旁流] 在儒、墨、杨三家相争的时候，又起一个较小的旁流，这是一崭新的流，却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此流即惠施、公孙龙辩者之学。儒、墨、杨始终不专于求知，惠施、公孙龙才开始专注意辩，注意小问题的分析。辩者之风起，墨家也受其影响，结果有

墨经的成就。然惠施、公孙龙之学，竟没有完成而绝。

六、[初次合] 时间到汉初，社会政治的变化，致成思想界的变化。汉初道家思想盛，武帝则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表面上虽是孔学定于一尊，实际上汉以后的思想是儒道之合，但又有一个不健全的合，停顿的合，儒家的勇猛有为的精神不容存在了，道家的怀疑否认的精神也不容存在。先秦思想的活动状态停止了，而墨家更因新的社会情况的关系而完全消灭。

七、[外来的反] 中国本土的思想安定了，不久却输入了外来的思想，即佛教，又引起了大的变化。

佛教初来不盛，在魏晋时，引起了老庄思想的复活，对于孔教经术，成为一种反动。此潮因五胡乱华而不能继续下去，佛教却从此大盛起来。佛教初盛的时候是一个争斗时代，与中国本土传统斗。其后则是归依的时代，一般人遗忘了本土固有的哲学而皈依于佛教。佛教最盛时代在唐，在这时代中产生了几位中国佛教大思想家，他们根据佛教经典有所创发，他们的思想不是与中国古代思想成一系的，而是与印度思想成一系，却又不免带中国人气味。

佛教思想在根本上是与老庄相近的，是消极的、主静的，同是对中国固有的刚健宏毅的思想之反。

八、[再度的合] 佛教思想输入后，经历了许多年，中国人乃能消化之，重新建立新的哲学。这即新儒家，或道学、理学。新儒家的前驱是韩愈、李翱，正式成立的人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新儒家攻击释道二氏，实际吸收了释道二氏思想成分很多，乃是一合。新儒家